

儿童抑郁认知易感性的发展特点*

上官芳芳¹ 张兴利²

(¹北京市“学习与认知”重点实验室,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系, 北京 100048
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²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摘要 相对稳定的负性认知特征会使个体容易发生抑郁, 被称为抑郁认知易感性。文章总结并对比当前关于抑郁认知易感性的稳定性与可变性的观点, 提出从儿童发展早期开始研究认知易感性因素的必要性。接着回顾消极归因方式、功能失调态度和冗思这三种认知易感性因素在儿童期的表现及其前期心理特征, 试图找到抑郁认知易感性在个体发展中的连续性。建议今后探讨认知易感性因素在不同年龄的发展特点, 关注发展早期认知易感性因素的测量。

关键词 归因方式; 功能失调态度; 冗思; 儿童; 认知易感性

分类号 R395

抑郁症是现代 society 中最常见且致残率最高的心理障碍之一(Alloy, Abramson, Keyser, Gerstein, & Sylvia, 2008), 男性的终生患病率为 5%~12%, 女性为 10%~25% (APA, DSM-IV-TR, 2000)。更值得关注的是, 重性抑郁患者中 75% 首发于儿童或青少年时期, 只有 25% 首发于成年期(Kim-Cohen et al., 2003)。从儿童期向青春期过渡时抑郁症发病率陡然升高, 直到成年期的大多数时候依然维持在高水平。国内外研究结果显示儿童中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抑郁症标准的患病率较低, 儿童抑郁症终生患病率为 1.5%~2% (Wichstrøm et al., 2012), 而青少年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为 7% 左右(张郭莺, 杨彦春, 黄颐, 刘书君, 孙学礼, 2010; Kessler, Chiu, Demler, & Walters, 2005)。有研究报道 13 岁青少年的抑郁发病率大约为 2%, 到 18 岁则飙升至 17% (Wade, Cairney, & Pevalin, 2002)。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因此一直颇受关注, 其中发展最快、最有代表性的是认知易感性—应激模式的研究(邹涛, 姚树桥, 2006)。大量

研究证据表明认知易感性(cognitive vulnerability)对抑郁症发病的预测力较高(Hankin et al., 2009)。那么个体何时开始形成抑郁认知易感性? 研究者们对此仍然有着不同的见解, 而问题的核心是对抑郁认知易感性的稳定性和可变性的解释。这实质上是抑郁认知易感性的发展问题。

本文将总结并对比当前研究者们关于抑郁认知易感性的稳定性与可变性的观点, 提出从早期发展阶段开始研究儿童抑郁认知易感性的必要性, 接着回顾三种主要的认知易感性在儿童期的表现, 探寻各个认知易感性因素的前期心理特征, 试图找到抑郁认知易感性在个体发展中的连续性, 最后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1 抑郁认知易感性的稳定性和可变性

基于对抑郁认知易感性的稳定性和可变性的不同理解, 研究者可能侧重于不同年龄的群体来探讨这一问题。

许多研究者认为应从青春期开始研究抑郁认知易感性。他们认为抑郁认知易感性在青春期由于应激事件增多才得以显现(Alloy, Abramson, Walshaw, Keyser, & Gerstein, 2006; Jacobs, Reinecke, Gollan, & Kane, 2008), 并开始相对稳定(Hankin & Abela, 2005; Hankin, 2008)。Hankin 等人(2009)

收稿日期: 2012-10-30

*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经费资助; 北京市社科规划办项目(11JYB009)资助。

通讯作者: 上官芳芳, E-mail: shanggf@pku.edu.cn

同时强调,这并不表明抑郁认知易感性的发展有一个特定的终点;相反,由于多种生理/心理过程的参与以及环境的不断变化,可能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是抑郁认知易感性出现或稳定下来的时候。其稳定性和可变性可能在不同的时间点受到很多机制影响,从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他们的研究发现从青春早期到青春晚期,抑郁认知易感性的重测相关系数为 0.52。抑郁认知易感性的稳定程度可能随年龄增长而增强,其变化的规律则可能是年龄越小,变化越快。随着个体的成熟,能使抑郁认知易感性发生变化的情绪体验强度越来越高。抑郁认知易感性可能由于负性经验(例如,家庭暴力)的累积而变得越来越严重,也可能由于积极经验(例如,有效的心理治疗)而改善(Hankin, 2008)。

同样出于对个体发展全程中抑郁认知易感性的关注,另一些研究者则提出应从学龄期开始关注抑郁认知易感性的发展。他们回顾了对于青春前期儿童的认知易感性的研究,其中报告了儿童认知易感性短期的稳定性。同时发现,对于已被认可的各种抑郁认知易感性因素,研究者们既未能确定其相互关系,也尚未解释其相对应的前期认知特点。由于这些因素可能植根于学龄期,故他们认为有必要探究儿童抑郁认知易感性的内在本质,建议从 7~12 岁开始研究(Jacobs et al., 2008)。

尽管长久以来儿童的抑郁认知易感性未能得到充分的研究(Lakdawall, Hankin, & Mermelstein, 2007),但是 Beck 与 Bowlby 早在 60 年前就已提出,负性认知模式的发展在生命初期就受到个体经验的显著影响,早期经验与多年后的抑郁认知易感性有内在机制上的联系,当前只是由于研究方法的问题而无法在儿童发展早期找到抑郁认知易感性的证据(Morley & Moran, 2011)。

值得庆幸的是,新近的研究发现在幼儿时期负性认知思维已经出现(Morley & Moran, 2011; Hayden et al., 2008),并探查到婴儿大脑皮层 EEG 活动的不对称性与抑郁认知易感性的联系(Walsh, McDowall, & Grimshaw, 2010),这些都对儿童期抑郁认知易感性的研究有重要的启发。还有研究者提出儿童的抑郁认知易感性可能在抑郁发病中起中介作用,不同于其在成人中的调节作用(吴文峰,卢永彪,杨娟,谭芙蓉,姚树桥,2011)。这些证据提示在儿童期,抑郁认知易感性可能有一个

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

鉴于抑郁认知易感性因素在儿童中的研究已经开始逐步受到重视,以下将分别回顾消极归因方式、功能失调态度和冗思这三种抑郁认知易感性因素在儿童期的表现,并探讨其相对应的前期心理特征。

2 消极归因方式

2.1 概念

消极归因方式是目前在儿童中研究最多的抑郁认知易感性因素。Abramson, Metalsky 和 Alloy (1989)提出了三种促成抑郁的相对独立的认知因素,即将负性事件解释为自身能力缺陷、推断负性事件将引发其他不好的结果、将负性事件归因于全局性的和稳定的原因。这些认知因素会逐渐发展为绝望感,而绝望感被该理论认为是可以导致抑郁的最直接并充分的条件。

早期的理论模型都是为了详细解释消极归因方式与抑郁的关系,Hankin 和 Abramson (2001)的认知易感-应激交互作用模型则对抑郁的发展进行了解释,提出抑郁认知易感性(例如,消极归因方式)可以与初始负性情绪和/或负性事件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抑郁发生因果链(depressogenic causal chain)。认知因素被认为可以与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相互作用,导致最终发生抑郁的可能性更大。该模型还认为,遗传因素和不利的环境因素会共同影响人格的发展;行为遗传学研究则发现那些通常被认为是不利的环境因素,例如家庭不和睦,实际上也受遗传因素影响。因此这个模型是为了反映出一个现实,即个体发生心理障碍的倾向是先天-后天因素的复杂关系随时间展开的过程。这个规律对于理解抑郁认知易感性的发展非常重要。

2.2 儿童的消极归因方式

消极归因方式与抑郁的关系随个体发展而在功能联系或内容上有所变化。以往的研究发现,儿童能够发展出与抑郁相关的归因方式。但 Cole 和 Turner (1993)认为儿童的归因方式并不稳定,可能受应激事件的影响而改变;归因方式在童年早期到中期可能在应激事件与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而不是调节作用。根据这个观点,幼小儿童的消极归因源于负性生活事件并被内化,经不断发展成为抑郁认知易感性。在青春期,更稳定的消

极归因方式与生活应激相互作用产生了抑郁症状。Gibb 和 Alloy (2006)的研究支持这一观点,在五年级儿童中归因方式在应激事件和抑郁之间起中介和调节作用,但在四年级儿童中只有中介作用;也有纵向研究发现童年早期的消极归因方式会使儿童逐渐产生越来越多的有害的消极归因方式(Jacobs et al., 2008)。

2.3 前期心理特征

儿童的消极归因方式与个体发展早期的哪些心理特征有关呢?直接回答这一问题的研究还非常有限,但已有的一些研究提示了气质与消极归因方式和绝望感的关系。气质与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抑郁有关联(Hankin et al., 2009)。气质是受遗传中度影响的特征,其三个主要维度是消极情绪、积极情绪和注意控制(Compas, Connor-Smith, & Jasser, 2004)。

有研究者认为消极情绪作为预先存在的易感性之一,使得个体经历负性事件和形成抑郁认知易感性的概率增大;而抑郁认知易感性一旦形成,就会与应激源相互作用,并能预测抑郁症状的发生,其中应激源可能是个体具有的特定气质特征所引发的(Hankin et al., 2009)。

消极退缩(negative withdrawal)的气质特征在应激源和抑郁认知易感性的相关中起调节作用。在气质量表中消极退缩得分高的儿童可能对负性生活事件有更强烈的情绪反应,因此更容易对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做出抑郁症性的归因。这些儿童不喜欢甚至回避新奇环境,对新异刺激感到不安,容易沮丧、伤心、恐惧或流泪,对负性刺激高度敏感。当这些儿童面临负性生活事件时,他们可能由于自身的认知模式而反复地对事件做出消极归因(Mezulis, Hyde, & Abramson, 2006)。在较早的一项研究中,Kashani, Soltys, Dandoy, Vaidya 和 Reid (1991)发现,绝望量表得分高的儿童报告了更多困难的气质特征,特别是消极情绪、低适应性和高退缩性。但是这个研究是由儿童自己报告气质特征,他们的自我评估可能受到当时的绝望感和抑郁情绪的影响。

积极情绪缺乏在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中也常被借用作一种抑郁易感性因素,这一缺陷可能与绝望感的形成有关。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ality, PE)气质特征反映了个体体验积极的情绪状态、善于社交、积极融入周围环境的倾向。

研究发现大脑皮层后部活动的不对称性与 PE 得分较低有关。大脑皮层右后侧活动水平较左后侧减低,这种不对称可能与对环境刺激的认知评价困难有关(Shankman et al., 2005)。大脑皮层右后侧区域的活动在加工积极情绪刺激或奖赏刺激时最重要,在加工消极情绪刺激时则不是最重要的,而这个区域的活动性在抑郁症患者中可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断(Kayser, Bruder, Tenke, Stewart, & Quitkin, 2000)。一项研究分析了 5~6 岁幼儿大脑皮层后部 EEG 活动的不对称性与气质量表中 PE 得分的关系,并对幼儿 7 岁时在一个绝望感任务中的表现进行追踪。研究结果发现,大脑皮层左后侧区域活动性相对较高的儿童,PE 水平较低;在 7 岁时追踪测量则发现,这些儿童表现出较高的绝望感(Hayden et al., 2008)。

3 功能失调态度

3.1 概念

功能失调态度的概念来自 Beck 的抑郁认知模型。Beck 于 1987 年提出抑郁的认知模型,其核心是适应不良的自我图式,图式中的失败感、无价值感、功能失调态度等构成了抑郁认知易感性,功能失调态度被认为是抑郁发病的核心要素。

功能失调态度指个体自我评价时的认知歪曲,这种认知歪曲可以导致个体产生对于自我、世界和未来的过分消极的评价。Alloy 等人(2006)对成人的研究发现,抑郁症的首次发病更可能发生在具有高水平功能失调态度和消极归因方式的个体中。在青少年中的研究发现,功能失调态度可以单独或者与应激事件相互作用预测抑郁症的发生(Abela & Sullivan, 2003)。一些青少年可能构建一种功能失调态度,认为自己的价值有赖于同伴对自己的接纳程度。例如,当一个构建了这种态度的青少年没有被邀请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负性生活事件)时,这种功能失调态度就会被激活,他会得出结论,认为自己没有被邀请是因为自己没有价值。研究发现,经常使用功能失调态度的青少年发展出抑郁症状以及抑郁症复发的风险都提高(Abela & Skitch, 2007; Marcotte, Lévesque, & Fortin, 2006)。功能失调态度与归因方式一样,可能与情绪之间存在交互作用(Jacobs et al., 2008)。

3.2 儿童的功能失调态度

功能失调态度在儿童中的研究较少。Abela

和 Sullivan (2003)在验证 Beck 的抑郁认知易感性-应激理论的研究中发现负性生活事件与功能失调态度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但这只发生在高自尊的儿童中。另一项研究(Abela & Skitch, 2007)则发现具有高水平功能失调态度和低水平自尊的儿童在负性生活事件增多时出现更多的中度抑郁;该研究中最小的儿童为 6 岁,表明年幼的儿童也会经历功能失调态度的负面效应。因此,在儿童中的功能失调态度研究结果尚不统一,原因可能是发展因素或测量方法。但是在这些研究中,自尊是一个独特的变量,能够影响功能失调态度对儿童抑郁症风险的预测(Jacobs et al., 2008)。纵向研究发现 2~3 岁时的自我认知与儿童的自尊发展有关,且功能失调态度本身是适应不良的自我图式的一部分,所以,功能失调态度的发展应该与儿童的自我认知发展密切相关。

3.3 前期心理特征

根据功能失调态度的概念及相关研究,不难推断自我认知在功能失调态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发展早期,自我认知的个体差异可能已经奠定了 6 岁以后可测量的功能失调态度的基础。消极的自我认知被认为来自重要他人(例如父母、老师)对儿童能力的消极评价。自我认知与抑郁可能是交互影响,也可能是随着个体的发展,两者关系发生了变化,即在发展早期,消极的自我认知导致抑郁,到发展后期则反之(Jacobs et al., 2008)。童年中期一个主要的发展任务就是建构个体关于能力的自我感觉。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能够对自己的能力做出现实的判断。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应激源会影响个体正在形成的关于能力的认知,从而增加抑郁症状出现的风险。不准确或者消极的自我认知可能在负性生活事件和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即生活事件预测自我认知的变化,自我认知则预测抑郁症状的改变。随着个体的发展,自我认知可能变为一个调节变量,调节生活事件与抑郁之间的关系(Jacobs et al., 2008)。

自我认知在很早的发展阶段即表现出个体差异。例如,近期的研究发现在 12 个月时被评估为不安全依恋型的婴儿在 18 个月时更多地表现出自我知觉的能力(Morley, & Moran, 2011)。明尼苏达大学的纵向研究(Sroufe, 2005)发现在婴儿期表现为矛盾型依恋的幼儿在 2 岁时面对挑战性任务缺少安全型和回避型依恋者所具有的自信和坚持

性;3 岁时的追踪评估则发现婴儿期表现为矛盾型依恋的个体在坚持性、热情和顺从方面得分显著低于另外两组,而安全型依恋者则在不可能任务情境中表现出比不安全依恋型(矛盾型和回避型)者更有能力,即表现出更多灵活性、坚持性、积极情感以及集中注意的能力。他们的研究(Sroufe, 2005)还表明婴儿期的安全依恋可以预测 10 岁时儿童的自信、好奇心、自尊以及对新环境和挑战的热情(Morley, & Moran, 2011)。

4 冗思

4.1 概念

Nolen-Hoeksema 对抑郁时的冗思(即情绪性冗思, emotion-focused rumination)给出了定义:“反复思考自己的抑郁症状及其原因、意义和后果”。情绪性冗思的个体不能够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以减轻其症状或改善其境况(Nolen-Hoeksema, Wisco, & Lyubomirsky, 2008)。

4.2 儿童的冗思

新近的一些研究指出,冗思反应方式在 7~10 岁即出现(Gentzler, Wheat, Palmer, & Burwell, 2013; Driscoll, Lopez, & Kistner, 2009),其对抑郁症状的预测与年龄无关。相关的研究较少,一项研究(Roelofs et al., 2009)对 803 名 10~17 岁的被试进行 8~10 周的追踪,结果表明,女孩的冗思得分显著高于男孩,但是冗思对抑郁症状的预测在各个年龄段中是没有显著差别的。反应方式与抑郁症状的相关性在男孩和女孩中也没有显著差别。这表明冗思作为一种认知易感性可以用于评估儿童。

冗思包括自我参照加工和负性情绪注意偏向(Nolen-Hoeksema et al., 2008)。抑郁症儿童的自我参照加工效应很早就受到关注,最近的研究找到了 7~13 岁儿童区别自我相关信息和母亲相关信息的脑区(Ray et al., 2009)。由此可见儿童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自我图式与冗思反应方式的形成可能有关联,但是这需要相关的纵向研究提供证据。Joormann (2005)的综述指出越来越多的研究提示冗思与抑制性加工(inhibitory processes)的缺陷有关,特别是在对负性信息加工时。研究发现母亲患抑郁症的女孩会选择性地注意负性情绪面部表情,其对照组女孩则选择性地注意正性情绪面部表情;重度抑郁的儿童容易受负性情绪图片影响

而分心, 对照组儿童则容易被正性情绪图片分心 (Ladouceur et al., 2005; Joormann, Talbot, & Gotlib, 2007; Johnson, Joormann, & Gotlib, 2007)。

4.3 前期心理特征

根据目前研究的证据, 可以认为冗思出现的时间较晚, 前两种认知易感性因素(消极归因方式和功能失调态度)可能本身可以作为冗思形成的前期基础。另外, 前已述及抑制性加工的缺陷与冗思的关联, 因此个体执行功能发展的水平可能是冗思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基础特征。以下将对这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4.3.1 消极归因方式与功能失调态度

在三种抑郁认知易感性因素中, 冗思可能出现最晚, 且可能在消极归因方式、功能失调态度的基础上更容易形成。为了更好地理解冗思在抑郁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可以借鉴 Abela 的最弱联结理论。Abela 和 Sarin (2002)针对抑郁绝望理论, 提出“最弱联结”理论, 认为绝望理论中的三种负性认知中, 越晚发展起来的“最弱(最易感)”点, 越容易成为个人稳定的易感因素。那么, 冗思是否是三种抑郁认知易感性因素中出现最晚且与抑郁联系最紧密的因素呢? 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检验。

Abramson 等人(2002)分析绝望感理论和 Beck 认知理论中认知易感性的概念, 并根据自我调节的观点详细叙述了这两种认知易感性因素与冗思的关系。他们提出, 具有功能失调态度和消极归因方式的个体有更高的冗思风险, 更没有能力打破当下的消极自我调节循环。在大学生和成年人群体中的研究表明, 三种认知易感性因素(功能失调态度、消极归因方式, 冗思)同时存在的个体出现更持久的抑郁症状、更严重的抑郁发作, 和慢性抑郁的风险更高(Lo, Ho, & Hollon, 2008; Robinson & Alloy, 2003)。

新近的一项研究(Young, LaMontagne, Dietrich, & Wells, 2012)则考察在青少年群体中, 这三种抑郁认知易感性因素与负性生活事件在抑郁发生中的作用。研究对象为 12~15 岁的青少年(63 名女孩, 48 名男孩), 结果发现三种抑郁认知易感性得分都与负性生活事件数量呈正相关关系, 其中冗思反应方式与负性生活事件数量的相关系数最大; 三种抑郁认知易感性也都与个体报告的抑郁症状呈显著的正相关。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还发现, 在控制了性别、负性生活事件数量之后, 只有

冗思对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有显著的影响。

4.3.2 执行功能发展水平

关于冗思与执行功能的关系, 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但是童年期的执行功能发展与抑郁认知易感性的关系尚没有得到重视, 这可能与抑郁认知易感性本身在儿童中的研究较少有关。

一种观点认为抑郁性冗思是由自上而下的加工过程驱动的, 与个体尝试对负性事件和负性情绪赋予意义的努力有关。支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们认为, 在青少年时期, 执行功能的发展作为抑郁认知易感性的先决条件外显出来并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Jacobs et al., 2008)。青少年时期不断发展的执行控制能力调节并管理着个体的认知资源(Alloy et al., 2006)。随着个体的发展, 执行功能转化为不断增强的自上而下的认知模式。与之平行的信息加工协调能力——自下而上的认知模式则允许个体有策略地使用不断出现的认知资源, 信息加工和认知推理两种能力相互协调地工作。事实上, 有研究表明, 自下而上的认知能力在加工效率和工作记忆上的发展支持着认知推理(自上而下的认知模式)能力的提高(Demetriou, Christou, Spanoudis, & Platsidou, 2002)。信息加工速度从童年早期到青少年中期都在不断发展, 信息加工速度的提高使得自上而下的加工效率更高, 包括社会性问题解决的效率, 从而使得冗思的形成有了可能。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冗思是由于执行控制的缺陷使抑郁症患者难于控制不相关的消极信息进入工作记忆, 并难于去除工作记忆中不再与任务相关的消极内容。例如, 关于过去的失败经验的消极认知始终活跃于工作记忆中(例如我没通过上次考试, 这次怎么可能通过), 这些消极认知会干扰当前任务的执行过程(例如对考试的准备)。由于对消极信息加工的解除困难, 导致消极信息进一步被精细加工并储存在长时记忆中, 形成记忆偏向 (Everaert, Koster, & Derakshan, 2012)。

执行功能发展的缺陷还可能导致大脑的活动转向另一种模式, 所以有研究者提出冗思这种自我反思式的思维, 可能与缺省模式网络(default-mode-network, DMN)有关(Bar et al., 2007)。DMN 是一组在任务过程中相关神经活动持续处于低水平的脑区。DMN 包括扣带回后部、内侧前额叶和颞叶大部分区域(Raichle et al.,

2001)。在任务执行过程中,这些脑区与任务相关的活动降低,但是这些脑区相互之间的联结活动却高度活跃。这种静息状态下的活动被称为大脑的缺省活动模式,用来指代这样一种状态——个体清醒且保持着警觉,但是没有积极参与到需要注意或有目标的任务中。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大脑皮层没有表现出对这种自我反思的调控能力,或者对过去的事件进行积极的认知重评。DMN的观点提示抑郁症患者可能是由于冗思占尽了注意资源,而使得其大脑皮层对抑郁性认知的随意控制能力降低或缺如(Koster, Lissnyder, Derakshan, & de Raedt, 2011)。

以上两种观点的对立提示研究者需要进一步探讨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执行功能与自下而上的信息加工的关系,阐明冗思发展的过程。

5 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在儿童抑郁认知易感性发展方面尚有许多未解之谜。首先,三种抑郁认知易感性在儿童发展中的相互联系(图1)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解决。一方面,在儿童发展的不同阶段(例如婴儿期、青春早期)中,分别有哪些抑郁认知易感性是对抑郁最关

键的预测因素?当前的研究尚未对抑郁认知易感性的预测作用进行分段研究,但这是从儿童开始及早预防抑郁症的关键问题。另一方面,当个体形成冗思反应方式后,功能失调态度和消极归因方式在抑郁发生的过程中是否还有重要的作用?由于已有研究提示冗思的出现可能建立在功能失调态度和消极归因方式之上,且可能与抑郁症状的关系最为密切,那么是否在成年个体中,最重要的认知易感性因素是冗思?第二,关于冗思的发展,究竟是执行控制的缺陷导致了冗思,还是自上而下的信息加工驱动了冗思?这需要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发展与冗思形成的关系进行探讨。这个问题的解答有利于精确锁定研究范围,寻找与之相对应的内表型,从而开发有效的治疗药物和方法。第三,个体发展早期的抑郁认知易感性亟待研究。早期有哪些心理特征是认知易感性的心理基础?前人的研究已经提供了许多线索,但是要研究这个问题,先要解决儿童期认知易感性(例如绝望感)的测量方法。总之,未来的研究将需要更多地从整合的视角看待不同的抑郁认知易感性因素,从发展的角度将各种认知易感性因素联系起来,从而更好地解释抑郁认知易感性发展的稳定性和可变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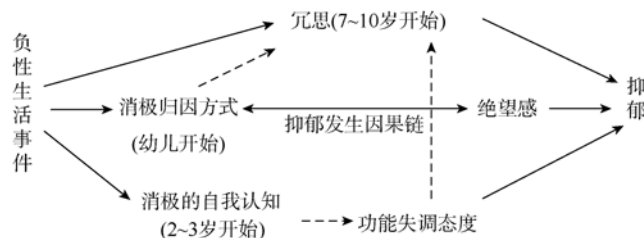


图1 三种抑郁认知易感性因素在儿童发展中的相互联系

注:三种抑郁认知易感性因素各自出现的时间可能不同,并各有其相对应的前期心理特征。冗思可能是出现最晚的抑郁认知易感性因素。具有消极归因方式和功能失调态度的个体更可能发展出冗思反应方式。虚线箭头代表这些联系相关的研究证据较少,需要更多研究的支持。

致谢: 本文撰写过程中作者得到了多位老师的帮助,在此郑重致以衷心的感谢。感谢审稿老师和编委老师给出的中肯意见,这些意见对提升稿件质量有莫大的帮助。感谢导师施建农教授的宝贵建议。感谢师姐张琼教授的耐心阅读和修改。

参考文献

吴文峰, 卢永彪, 杨娟, 谭芙蓉, 姚树桥. (2011). 抑郁绝

望理论在我国儿童中适用性的追踪研究. *心理科学*, 34(2), 465-470.

张郭莺, 杨彦春, 黄颐, 刘书君, 孙学礼. (2010). 成都市6~16岁儿童少年抑郁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4(3), 211-214.

邹涛, 姚树桥. (2006). 抑郁认知易感性应激模式的研究: 起源、发展和整合. *心理科学进展*, 14(5), 762-768.

Abela, J. R. Z., & Sarin S. (2002).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hopelessness depression: A chain is only as strong as its

- weakest link.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6(6), 811–829.
- Abela, J. R. Z., & Skitch, S. A. (2007).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self-esteem, and hassles: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in children of affectively ill parent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5(6), 1127–1140.
- Abela, J. R. Z., & Sullivan, C. (2003). A test of Beck's cognitive diathesis-stress theory of depression in early adolescents.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23(4), 384–404.
- Abramson, L. Y., Alloy, L. B., Hankin, B. L., Haefel, G. J., MacCoon, D. G., & Gibb, B. E. (2002). Cognitive vulnerability-stress models of depression in a self-regulatory and psychobiological context. In I. H. Gotlib & C. L. Hammen (Eds.), *Handbook of depression* (pp. 268–294).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Abramson, L. Y., Metalsky, G. I., & Alloy, L. B. (1989). Hopelessness depression: A theory-based subtype of depress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6(2), 358–372.
- Alloy, L. B., Abramson, L. Y., Keyser, J., Gerstein, R. K., & Sylvia, L. G. (2008). Negative cognitive style. In K. S. Dobson & D. J. A. Dozois (Eds.), *Risk factors in depression* (pp. 237–262). San Diego: Elsevier Academic Press.
- Alloy, L. B., Abramson, L. Y., Walshaw, P. D., Keyser, J., & Gerstein, R. K. (2006). A cognitive vulnerability-stress perspective on bipolar spectrum disorders in a normative adolescent brain,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context.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18(4), 1055–1103.
- Cole, D. A., & Turner, J. E., Jr. (1993). Models of cognitive mediation and moderation in child depressio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02(2), 271–281.
- Compas, B. E., Connor-Smith, J., & Jaser, S. S. (2004). Temperament, stress reactivity, and coping: Implications for depression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y*, 33(1), 21–31.
- Demetriou, A., Christou, C., Spanoudis, G., & Platsidou, M. (2002).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processing: Efficiency, working memory, and thinking. *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67(1), i–viii, 1–155.
- Driscoll, K. A., Lopez, C. M., & Kistner, J. A. (2009). A diathesis-stress test of response styles in children.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8(8), 1050–1070.
- Everaert, J., Koster, E. H. W., & Derakshan, N. (2012). The combined cognitive bias hypothesis in depression.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32(5), 413–424.
- Gentzler, A. L., Wheat, A. L., Palmer, C. A., & Burwell, R. A. (2013). Children's responses to cognitive challenge and links to self-reported rumination. *Cognition & Emotion*, 27, 305–317.
- Gibb, B. E., & Alloy, L. B. (2006). A prospective test of the hopelessness theory of depression in children.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y*, 35(2), 264–274.
- Hankin, B. L. (2008). Stability of cognitive vulnerabilities to depression: A short-term prospective multiwave study.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17(2), 324–333.
- Hankin, B. L., & Abela, J. R. Z. (2005). Depression from childhood through adolescence and adulthood: A developmental vulnerability-stress perspective. In B. L. Hankin & J. R. Z. Abela (Eds.), *Development of psychopathology: A vulnerability-stress perspective* (pp. 245–288). Thousand Oaks, CA: Sage.
- Hankin, B. L., & Abramson, L. Y. (2001). Development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depression: An elaborated cognitive vulnerability-transactional stress theor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7(6), 773–796.
- Hankin, B. L., Oppenheimer, C., Jenness, J., Barrocas, A., Shapero, B. G., & Goldband, J. (2009). 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cognitive vulnerabilities to depression: Review of processes contributing to stability and change across tim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65(12), 1327–1338.
- Hayden, E. P., Dougherty, L. R., Maloney, B., Olino, T. M., Sheikh, H., Durbin, C. E., ... Klein, D. N. (2008). Early-emerging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and the serotonin transporter promoter region polymorphism.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07(1–3), 227–230.
- Jacobs, R. H., Reinecke, M. A., Gollan, J. K., & Kane, P. (2008). Empirical evidence of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for depression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cognitive science and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8(5), 759–782.
- Johnson, S. L., Joormann, J., & Gotlib, I. H. (2007). Does processing of emotional stimuli predict symptomatic improvement and diagnostic recovery from major depression? *Emotion*, 7(1), 201–206.
- Joormann, J. (2005). Inhibition, rumination, and mood regulation in depression. In: R. W. Engle, G. Sedek, U. von Hecker, & D. N. McIntosh (Eds.), *Cognitive Limitations in Aging and Psychopathology* (pp. 275–312).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oormann, J., Talbot, L., & Gotlib, I. H. (2007). Biased processing of emotional information in girls at risk for depressio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16(1), 135–143.
- Kashani, J. H., Soltys, S. M., Dandoy, A. C., Vaidya, A. F., & Reid, J. C. (1991). Correlates of hopelessness in psychiatrically hospitalized children. *Comprehensive Psychiatry*, 32(4), 330–337.

- Kayser, J., Bruder, G. E., Tenke, C. E., Stewart, J. E., & Quitkin, F. M. (2000).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s) to hemifield presentations of emotional stimuli: Differences between depressed patients and healthy adults in P3 amplitude and asymmet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36(3), 211–236.
- Kessler, R. C., Chiu, W. T., Demler, O., & Walters, E. E. (2005). Prevalence, severity, and comorbidity of 12-month DSM-IV disorders in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Replication.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62(6), 617–627.
- Kim-Cohen, J., Caspi, A., Moffitt, T. E., Harrington, H., Milne, B. J., & Poulton, R. (2003). Prior juvenile diagnoses in adults with mental disorder: Developmental follow-back of a prospective-longitudinal cohort.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60(7), 709–717.
- Koster, E. H. W., De Lissnyder, E., Derakshan, N., & de Raedt, R. (2011). Understanding depressive rumination from a cognitive science perspective: The impaired disengagement hypothesi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31(1), 138–145.
- Ladouceur, C. D., Dahl, R. E., Williamson, D. E., Birmaher, B., Ryan, N. D., & Casey, B. J. (2005). Altered emotional processing in pediatric anxiety, depression, and comorbid anxiety-depression.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3(2), 165–177.
- Lakdawalla, Z., Hankin, B. L., & Mermelstein, R. (2007). Cognitive theories of depression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conceptual and quantitative review.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10(1), 1–24.
- Lo, C. S., Ho, S. M. Y., & Hollon, S. D. (2008). The effects of rumination and negative cognitive styles on depression: A mediation analysi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6(4), 487–495.
- Marcotte, D., Lévesque, N., & Fortin, L. (2006). Variations of cognitive distortions and school performance in depressed and non-depressed high school adolescents: A two-year longitudinal study.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30(2), 211–225.
- Mezulis, A. H., Hyde, J. S., & Abramson, L. Y. (2006). The 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Temperament, parenting, and negative life events in childhood as contributors to negative cognitive styl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2(6), 1021–1025.
- Morley, T. E., & Moran, G. (2011). The origins of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in early childhood: Mechanisms linking early attachment to later depression.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31(7), 1071–1082.
- Nolen-Hoeksema, S., Wisco, B. E., & Lyubomirsky, S. (2008). Rethinking rumination.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3(5), 400–424.
- Raichle, M. E., MacLeod, A. M., Snyder, A. Z., Powers, W. J., Gusnard, D. A., & Shulman, G. L. (2001). A default mode of brain fun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98(2), 676–682.
- Ray, R. D., Shelton, A. L., Hollon, N. G., Michel, B. D., Frankel, C. B., Gross, J. J., & Gabrieli, J. D. E. (2009). Cognitive and neural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ted self-representation in children. *Child Development*, 80(4), 1232–1242.
- Robinson, M. S., & Alloy, L. B. (2003). Negative cognitive styles and stress-reactive rumination interact to predict depression: A prospective study.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7(3), 275–291.
- Roelofs, J., Rood, L., Meesters, C., Dorsthorst, V., Bögels, S., Alloy, L. B., & Nolen-Hoeksema, S. (2009). The influence of rumination and distraction on depressed and anxious mood: A prospective examination of the response styles theory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Europea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18(10), 635–642.
- Shankman, S. A., Tenke, C. E., Bruder, G. E., Durbin, C. E., Hayden, E. P., & Klein, D. N. (2005). Low positive emotionality in young children: Association with EEG asymmetry.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17(1), 85–98.
- Sroufe, L. A. (2005). Attachment and development: A prospective, longitudinal study from birth to adulthood. *Attachment & Human Development*, 7(4), 349–367.
- Wade, T. J., Cairney, J., & Pevalin, D. J. (2002). Emergence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depression during adolescence: National panel results from three countr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41(2), 190–198.
- Walsh, A., McDowall, J., & Grimshaw, G. M. (2010). Hemispheric specialization for emotional word processing is a function of SSRI responsiveness. *Brain and Cognition*, 74(3), 332–340.
- Wichstrøm, L., Berg-Nielsen, T. S., Angold, A., Egger, H. L., Solheim, E., & Sveen, T. H. (2012). Prevalence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Preschooler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53(6), 695–705.
- Young, C. C., LaMontagne, L. L., Dietrich, M. S., & Wells, N. (2012). Cognitive vulnerabilities,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young adolescents. *Archives of Psychiatric Nursing*, 26(1), 9–20.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SHANGGUAN Fangfang¹; ZHANG Xingli²

(¹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Learning and Cognitio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²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ur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Several cognitive theories of depression vulnerability have been proposed, but development of these cognitive factors has not caught much atten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investigating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CVD)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First, it is suggeste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when CVD emerges and becomes relatively stable in childhood, especially early childhood. Second, development of three cognitive factors, including attributional styles,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and rumination response style, were reviewed to support continuity of CVD. New insights and implications for assessment and etiology of CVD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attributional style; dysfunctional attitude; rumination; children; cognitive vulnerability